

占卜术与时间焦虑

——当代青年的自然节律时间与社会时间之间的张力

□ 邢婷婷

摘要：本文以当代青年人的占卜实践为切入点，观察个体的自然节律时间与外在的社会时间之间的张力，以及如何应对这种张力所造成的时间焦虑。人们希望通过占卜术调和两种时间之间的张力，缓解个体的时间焦虑。占卜术对时间焦虑的缓解是有条件的：当社会时间的重要性被解构、个体自然节律时间得到凸显，个体体验得到重视、能够感受到希望时，对缓解时间焦虑是有效的；当社会时间的压力未被打破，个体体验未能得到重视、个体没有看到希望时，对缓解时间焦虑无效。占卜术对时间焦虑的作用只能是缓解，而无法解决。个体被卷入抽象的时空状态、个体经验未得到尊重，人试图通过占卜术解释个体经验并寻求意义建构。

关键词：时间焦虑；占卜术；社会时间；自然节律时间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19.0011

一、问题提出

“时间”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维度之一，是理解人们情感归属、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重要途径，对时间的理解是观察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效切入点^[1]。在一般观念中，时间是单向度的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个体受到时间必然性的约束。但事实上，时间既是自然的表现，也是人类社会

的产物。人如何认识时间、如何调适自身与时间之间的关系，伴随人类至今。当代社会，时间制度呈现出标准化和抽象化的特征^[2]，当个体自然的时间节律不能与时间制度相合拍的时候，二者之间的张力便出现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焦虑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3]。时间焦虑是社会焦虑的表现形式之一，“抓住时间窗口”“出名/发财要趁早”

等流行语都体现着人们的时间焦虑,担心自己无法跟上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成为时代的弃儿。

八字、风水、占星、打卦这些我们习惯称之为“封建迷信”的事物在科学昌明、教育普及的年代本该销声匿迹,但现实中这些事物仍然存在着广阔的生存空间。本文聚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大型城市生活、初入劳动力市场、处于职业发展的起步阶段的青年人。他们从小就系统地接受了科学主义教育,拥有完整的教育经历和较好的职业发展路径,与广大的县乡农村、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众有显著区别^[4],这些人理应对占卜术持否定态度。所以,考察他们接触占卜术的原因,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下国人的精神状态和信仰状况找到一个新的视角。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个体的自然节律时间与社会时间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焦虑情绪,重点关注个体为认识和应对时间焦虑所采取的行动。人们运用占卜术应对时间焦虑,原因何在、如何运用、起到了什么作用。

二、文献评述

这一部分将对本文的两个核心概念——“时间观”和“焦虑”——展开讨论,厘定本文使用概念的内涵、外延和理论语境。接下来梳理现有的关于占卜术在当代中国社会兴起的社会学解释,进而勾勒出本文的中心问题。

1. 关于“时间观”的讨论

时间观念是随着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和变化而形成、变化和发展的。围绕着时间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议题,时间观念大致形成了四种范式。

(1) 自然时间观

自然时间观在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主宰的地位。自然时间依据天文变化而确立,它所表征的自然物质不受人的力量的影响和作用,其顺序和延续的过程按照自然的法则展开。依据天体运动而形成的时间通常被假定为人们生活的唯一时间度量标准^[5]。

自然时间观从两方面塑造了人的认识:一方面,人们通过时间建构起了一种循环的意识。时间的变化与天体的运转密不可分,四季轮回、昼夜更迭、生老病死等都是自然循环的一个部分,人无法超越、只能顺应^[6]。另一方面,循环的时间意识催生出各种传

统和习俗,通过一系列的节日、律令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建构出了社会生活的秩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看似自然而然,但它通过“阴阳割昏晓”“明而动、晦而休”划出了中心/边缘、上层/下层的分野,进而与政治上的合法/非法,社会生活中的正常/非常联系起来,划出农业社会所需的生活秩序的界限^[7]。

自然时间观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时间具有必然性,外在于人及人的行动而存在;时间是循环的;时间是具体的,是嵌入在生活场景之中的;人的认识和社会生活的秩序,都是自然时间的投射。

(2) 基督教传统下的历史时间观

西方文明进入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下的历史时间观逐渐取代了自然时间观。宗教上的一神论在认识论上表现为一元主义,时间成为一个过程,是贯穿于“过去—现在—未来”之间一条永远向前的直线,创世纪是这个过程的起点,一直通向“末日审判”。

这一时间观突破了循环论,指明时间具有鲜明的线性指向,认为每一轮循环往复对于人类整体的发展而言,都意味着一次次历史性的救赎与蜕变。时间从具体的场景中独立了出来,具有了抽象性。时间的抽象性激发人们认识时间所蕴含的规律、趋势,为人类在时间面前确立主体性打开了出口。

这一时间观与自然时间观的共同之处在于:时间外在于人及人的活动而存在,人要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么被神的意志裹挟进历史的洪流。人的主观意识仅体现在对时间的投射、认识和适应上面。

(3) 存在主义时间观

存在主义时间观的关键在于,突出了“人”在处理与时间的关系时的主体性与建构作用,认为人对生命与生活的体验体现在对时间的不同理解之中。存在主义哲学对时间的理解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将生命与时间连接起来,时间是生命本质“自我显现”的过程,时间的意义存在于人的生活之中。时间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它不是单纯的计量单位,也不是表象中的先天直观形式。时间先于人自身的存在而存在,统一于存在的整体性之中^[8],它强调了人的体验,指出不能外在于人的生存的过程而理解时间,但对于存在与时间的体验如何与社会生活相联系,并不是这种时间观所关注的重点。

(4) 社会时间观

社会时间观认为,时间意识是人类在协调人与自

然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时产生的,“时间观念”属于社会的范畴,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

社会时间观有三个层面的特性。第一,实践性。马克思从人的社会劳动出发,“实践”是建构社会时间的关键,人与时间在实践中相互作用,从而将自然时间社会化^[9]。第二,集体性。涂尔干将时间视为“集体意识”的产物,它分成若干的时段、事件与活动,并按照一定的社会节奏排布,承载着习俗传统、伴随着集体生活的烙印,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规律性^[10]。第三,结构性。社会群体及群体活动的节奏是社会时间的基础,人所隶属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时间价值取向和对待时间的态度,不同的群体确定和记忆自己认为重要的时间^[11],现实生活中的时间是多重的。社会时间观肯定了人的能动性,认为时间是人类集体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产物。

正是由于上述三方面的特性,社会时间观被不断改写。

首先,人类的实践活动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现代时间均质计量单位标准性的根据,先将时间进行抽象、计量,进而整合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与交换,建立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标准化的时间衡量系统^[12]。尽管社会时间肯定了人的能动性,但这里的“人”是抽象的,与个体的处境、当下的情景和感受并不直接相关。

其次,时空分离。钟表的出现使得精确的计时开始出现在人类生活当中,时间得以统一度量,标准化的时间体系得以建立,“脱嵌”由此产生^[13],技术发展对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的重塑作用,使得个体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或者哪个层次,都会被通过时间整合进庞大的政治-经济体系当中,脱离其物理属性。

再次,时间就是权力,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象征和制订时间的规则,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14],时间霸权就此产生。上层阶级、社会的主流群体决定着时间的意义和重要性,而下层阶级、社会的边缘群体的时间则是不重要或无意义的。当代社会,技术的强势介入,使时间不断加速、空间不断压缩;资本、商品、信息、权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15],个体被迫投入到一种充满着现实紧迫感的环境当中,笼罩在“存在性焦虑”的铁笼下^[16]。

2. 关于“焦虑”的讨论

对焦虑的讨论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心理学家认

为,焦虑是一种心理现象;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试图讨论,焦虑是一种社会事实。

(1) 作为心理现象的焦虑

心理学从人格的角度讨论焦虑问题,认为焦虑是人们面对危险和不确定性时,个体由于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而启动的情感上的自我保护机制,这种机制往往与个体的人格相关联,其本身可能就是人格的一部分。心理学区分了焦虑与恐惧、压力等概念^[17],试图将焦虑与人格联系起来。此外,在讨论人们应对焦虑的方式时,也倾向于认为这是人格的一部分,个体对焦虑的应对方式的差异是不同人格特征的体现。

心理学家并不否认焦虑的社会属性。个体的焦虑会通过一个放大机制和达成共识的过程,“集合”成社会焦虑^[18]。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个体焦虑的因素被不断地重申、提炼、放大,使本来间断的、含混不清的焦虑的来源和内容变得持续、清晰起来,再反作用于个体,不同的个体之间便对某种焦虑达成了共识。在心理学看来,社会文化因素是影响“心理”的一种“条件”。

(2) 作为社会事实的焦虑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将焦虑作为社会事实予以讨论时,关注焦虑的社会生产过程及其社会文化意义。他们将焦虑的来源指向了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秩序被扰乱;引发无法预期和掌控的风险^[19];因为无能为力而产生的不安和恐惧。秩序被扰乱是焦虑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通过下述三个方面具体呈现出来。

首先,人类对于分类有一种源于天性的偏好,通过分类确定秩序关系^[20],秩序帮助人类建构意义感、安全感。结构有序可循,人便是安全的。社会变迁引发结构性的变化,既有的分类不断被打破,局部性、突发性事件的波及范围难以预计,陷入失序状态,个体处于结构性焦虑当中。

其次,阶层流动和财富流动所引起的焦虑。社会地位低的群体容易遭受不公正待遇,生活资源相对匮乏使得他们容易感到生活的压力。阶层位置和支配资源的能力总是具有相对性,无论是同一阶层内还是不同阶层之间,都会产生“比较”。在财富流动的问题上,市场希望通过货币手段、信贷创新来制造流动性、刺激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一旦放缓,财富流动就会停滞^[21];外部格局发生变化,个体手里

的财富稀释甚至消解,财富的增值和保值成为焦虑的又一来源^[22]。流动所引起的焦虑,关键在于对于资源的拥有和支配的不确定性。

再次,意义感的缺失所引起的焦虑。技术的发展导致资本、商品、权力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科技的强势介入生产出大量的信息资源。在信息饱和的环境中,符号来源多样化、变化很快,由此所产生的去中心化和即时体验使得人们需要适应角色多重化及即时转换的要求,制度化的稳定机制日益衰微^[23],人们熟练地运用各种符号,却悬浮在意义之上。意义感的确实造成的焦虑,本质上是如何建构认同感的问题。

综上所述,对于焦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焦虑的来源、产生的原因、形成机制及作用等问题上,对个体如何应对鲜有涉及。本文将焦虑放置在社会事实展开讨论,而讨论的侧重点则是个体对焦虑的认识、面对焦虑所采取的行动,以及行动的背后所要达成的目的。

3. 关于占卜术的讨论

占卜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长期存在,相应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包括命理、术数、巫术等在内的民间宗教是传统道德秩序的组成部分,发挥着维护乡民社会道德机制的功能^[24];第二种观点则将民间的命理占卜看作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映射与共振,个人与自然的合理配合是传统社会中人们算命的观念基础,“致中和”的理想境界为庙堂之上的精英传统与江湖之远的民间日常实践所共享^[25];第三种观点认为,传统中国没有超然性的宗教,人们没有向往彼岸世界的宗教价值观,包括占卜术在内的命理学替代宗教完成了个体命运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了中国人的认识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世俗化的价值取向^[26]。

西方学术语境中,“文化资源论(cultural source theory)”和“经验中心论(experience-centered approach)”是目前解释灵媒、占卜等现象最为重要的两种解释路径。文化资源论认为超自然的经验与科学伦理相背离,它主要是为处于经济和社会劣势地位的群体提供意义支持和社会关系网络^[27]。经验中心论则认为紧张、焦虑、沮丧等消极情绪是个体向超自然信仰求助的最主要的原因,用以缓解个体的消极情绪^[28]。

对于占卜术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呈现,中国的学者

尝试从两个角度解释。一种解释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出发,指出今天中国社会变迁影响深远,个体被卷入社会变革之中,很难对结构形成宏观认识,局部性、突发性事件的波及范围难以预计,怀疑与信任、安全与风险的平衡被打破,占卜术为个体应对和抵挡各种不确定性提供了方案^[29]。另一种解释则从行动者的角度出发,强调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个体经验和体验得到重视,人们从自身所面对的境遇出发选择最符合自身需求的信仰方式^[30],占卜术体现了较强的个体性与私人性的特征,是原子化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和理解占卜术在当代社会中的存在状况提供了总体性的材料,它们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兴起的原因上,占卜术的兴起是被解释的因素。那么,占卜术是如何运行的,它究竟对人的境遇如何产生作用,并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

三、研究方法 with 材料来源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群体,也不集中在一定的区域或空间内,需要较长时间“打入内部”。文章的实证材料来源于2013年开始至今笔者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开展的田野调查。

本文采用了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把研究的落脚点放置在人们对时间焦虑的体验和应对问题上,牺牲掉某些虚拟的全局性眼光以求认识更为具体的生活样貌^[31],去发掘现有研究尚未注意到的机制和逻辑。“当地人视角”是不用外在于研究对象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他们的行动,强调进入研究对象的行动逻辑当中予以解释。这一点对于研究有悖于常理的问题至关重要,就本文而言——为什么拥有良好的教育经历和科学知识的年轻人面对时间焦虑的时候会求助于占卜术?占卜术为什么在应对时间焦虑时别有一功?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深入到行动者的“内里”,用他们的视角予以分析。

笔者采取了以点带面、以深度带动广度、对建立关系的个案长期跟踪调查的方法获取第一手材料。与研究对象保持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参与他们的活动、分享他们的心得,并在必要的时候辅之以结构访谈。用滚雪球的方法不断扩大研究对象,了解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以及各自的行动逻辑,做到深入“内里”。

四、占卜实践的“江湖”

1. 占卜术在现实中的呈现方式

占卜实践在现实中的呈现状态不是铁板一块，它更像一个江湖，折射出深浅不一的介入程度，展现着形态各异的精神需求。在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网络算命的数量急剧增加、形式多样化、线上线下互动并行。在具体工具的选择上，既有中国传统的四柱八字、梅花易术、七政四余、六爻，也有外来的西方现代占星术、塔罗占卜等。

前来求助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32]：一类是要通过占卜来寻求一个答案，这类问题的关键词是“怎么办”。例如：两个选择摆在面前，各有利弊，应该如何取舍？个人意志与客观情况相左，该何去何从？突发事件令人措手不及，该如何应对？此类问题可以概括为“问事”，即预测某一具体事件的结果或者给出的建议。另一类是想通过占卜术来讨个说法，这类问题的关键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的运气总是那么差？状态不佳又苦于找不到出路，究竟该怎么办？此类问题可以概括为“看运”，即对一个人的运势、格局进行全局性的梳理和把握，来分析人的个性特征和命运走势。此类问题比例远高于前一类。

人们求助于占卜术的直接动机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感情、婚姻、子女、财产、职业等频繁出现。透过占卜的具体问题，背后体现出一些共性的诉求：在社会时间不断加速的情况下，个体对社会时间的把握往往缺乏宏观性和主动性，人们生怕“赶不上趟”的心理状态，担心错过了某一次机遇或某个时间点而被时代所抛弃。

2. 时间焦虑在占卜实践中的表现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物质极大丰富，社会矛盾也随之产生。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结构、劳动力的地理分布、工作模式的转型形成全面影响，青年一代常常感受到身不由己的压力，他们的时间焦虑主要体现在时间效率化和单向度发展观两个方面。

（1）时间效率化

当我们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当中，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方式一层一层波及到个体的身上，“竞争力”意味着时间效率化的加剧^[33]，单位时间内的产出是衡量个体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指标，在单位时间内比别人

更有产能才是有竞争力的表现。在观念上认同又快又好、以快为先，“慢”意味着低效率，“拖延”意味着缺乏竞争意识。这种社会心态氛围给青年人的观念和行为框定了一个“理想模型”，推动着他们的竞争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跟上社会大环境的时间节奏，有些人因为从事的行业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有些人本身对外部环境不敏感，无法准确捕捉到快速发展的路径，这使他们承受了时间效率化带来的巨大压力。

小超是个慢性子，喜欢做些“无聊的小事”，同学们毕业之后百舸争流的发展态势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

这个时代一直强调“快”，但我就是快不起来。你看我马上30岁了，又是个爷们儿，眼看着别人都风生水起的，着急。咋办？老话常说“人各有命”，自己到底是个什么命？找人看看八字呗。

小林是周围人眼中聪明又努力的小伙子。从小一路学霸，高考进入名牌大学的热门专业。但是研究生毕业后一段时间里，他的发展情况处于周围的平均水平之下，这令他感到失意和迷茫。

就像待在玻璃房子里，看得到外面，却不知道门在哪里。我去算命就是想问问，我还有戏吗？不都说人生充满变数吗？我的变数在哪里？还是我根本就是赶不上趟的人？

效率不断被强调，要求个体长期不断地自律，从而加强竞争力。“优秀”的界定标准在表面上来看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背后隐藏着共同的逻辑就是单位时间内快速、稳定、高效的产出。这样的追求没有客观上的节点，每前进一步都是相对的，需要长期保持高昂的士气，个体处于长期紧张的状态之中，自我怀疑和焦虑很难避免。

（2）单向度的发展观

单向度的发展观与时间效率化相伴而生。社会的发展仿佛是不断向上延伸的台阶，个体遵循着同样的方向，拾阶而上。变化是正常的、必然会发生的，停滞是竞争力退化的表现。单向度的发展观所造成的焦虑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对“稳定”的质疑，它不再具有压倒性优势，反而意味着无趣、呆板、胆小而缺乏冒险精神，不具备应变能力；人们要具备若干的知识、技能、判断力，从而让自己能够准确判断外部的发展变化、增强抓住机遇的能力，退一步讲，以备不时之需，来应

对各种突如其来。

小瑞今年33岁，当年高考顺利考入某985高校，直升研究生，硕士毕业留校从事行政工作，又考取了在职博士，顺利转入实验科研岗。毕业后在家长的支持下结婚、买房、生孩子，少有波折。她应该对生活高度满意，但她却说：

这三十来年的人生没有经历一点风吹草动。在“知乎”上看到一句话，想知道五年后自己的样子，就看看身边比你大5岁的同事，我一下子就特别心慌。我看星盘就想知道：一直过这种特别稳定的生活，万一发生什么变故，会不会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啊？

稳定曾经是国人最高的生活追求，因为它意味着物质资料、社会地位的保障，不必为衣食而忧。但在当前，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取代了稳定，对于青年人而言，稳定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温床，而是个体进阶的牢笼。

一种是对“失去”的担忧，对已经斩获的东西缺乏长期持有的信心。

小路生于70年代末期，专科毕业后通过会展工作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其间先是自考获得了本科文凭，又考取了全日制研究生。在资金、学历、经验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开始创业，创办了一家品牌战略咨询公司，40岁不到已经收获颇丰。她的问题在于如何让自己的财富保值并逐渐增长。她在投资房地产和移民之间举棋不定，于是想通过塔罗占卜术看看哪一条路更加稳妥：

牌一开出来，塔罗师说，你的问题在于八个字：能力有限、举棋不定。这我就被击中了！我不是那种大富大贵，可以大手笔规划，我真的是勤勤恳恳赚到一点小钱，所以特别在乎保障的问题。特别怕风向一变，行业不行了、有什么新的东西产生了，自己没察觉，就被大风扫落叶了。谁知道头顶哪块云要下雨，所以慌啊！

个体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应对外部世界的变迁心存疑虑，担心自己对突如其来的转变缺乏预判能力；社会时间在加速往前走，而自身万一没有跟上步伐、反而出现倒退的状况，这种担忧成为焦虑的另一诱因。

我的时间由谁规定？“我”的自然节律时间与外在的社会时间是否有协商或者斡旋的余地？顺着这两个问题，个体借助于占卜术来调节社会时间与个体自然节律时间之间的张力。下面笔者将以田野中长期追踪调查的深度个案为主、零星获得的研究资料为辅，来考察占卜术是如何调节自然节律的时间和外在的社

会时间之间的张力的。

五、占卜术有效缓解时间张力的两种情况

占卜术对于缓解时间焦虑有效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重视个体体验、给予个体希望；另一种是通过占卜术背后的知识体系，化解外在的社会时间观，帮助个体塑造新的时间观。

1. 第一种情况：重视个体体验、给予个体希望

笔者2013年进入田野便认识了小唐，他出生在西北某省会城市，高考进入全国排名前五的大学。但是，进入大学后他的状态一路下滑，本科毕业时找工作也四处碰壁，于是他决定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之际进入私营公司开始职业生涯，工作一直没有突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似乎又心有不甘。在第一次求助于占卜时，他已经觉得自己在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之中快要撑不住了。

他先是求助于八字。八字师傅告诉他，他这些年感到无力，是因为正在走一个叫做“枭神”的大运，这是一个被限制、缺乏资源支持的运势。好在一个大运十年，马上就要过去了，下一个大运有可能进入体制内的单位，有进展但不会是变革性的突飞猛进，再下一个十年可有一番作为。这个结果对于S君来讲是莫大的慰藉。

因为我看到了，尽管目前一时一地处于落后的状态，但未来有希望。后来想想，觉得特别有道理。我是小地方来的，考上名牌大学，留在上海，从出类拔萃到芸芸众生，的确需要经历一个转变的过程。从浑浑噩噩到找到方向，差不多需要十年时间。

两年后，他告别了私营企业，进入事业单位。从得到编制到获得第一次提拔，他只用了两年的时间，这在事业单位来讲算是较快的速度。体制内的工作大多按部就班，在短期难有超越性的作为；加之收入有限，与在市场上拼搏的同学相比，物质生活相形见绌。“担心被落下”的心态再次占据了他的思想。

于是，他第二次求助于八字先生，得到的建议是“按部就班、积蓄实力”。他结合自己的意愿对未来进行了规划。接下去的几年，生活稳扎稳打，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在互联网平台做文化传播的尝试，从微博到微信公众号，分享的内容由身体保健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组成。他在公众号上运用各种理论分析人生的困境、为读者答疑解惑。目前，他的微博有近八万粉丝，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阅读量都在3万左右，已经有

了向盈利方向运营的打算。时至今日，他与八字先生的关系逐渐转变成了师友，他带笔者走访了八字先生，共同探讨了人的运势与时间节律的问题：

每个八字都是十年换一次大运，有些人起运早，有些人起运迟，所以我们看到有人占尽先机、有人后来居上；有人顺风顺水、有人大起大落；也有些人时来运转一下子就上去了，也有些人就一直平平常常没什么大起色。人和人运程不一样，没有多少可比性，把自己和所有人放在一个框框里比较这个想法就不对。

小唐自己对占卜实践的评价是积极的，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走了那么多年背运，才会静下心来思考如何处理自我与外界的关系。他尤其肯定了八字流年运势对于个体认识和掌握自身命运的作用：

首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十年一个大运，就是每个人自身的时间节律，命运起伏、自成体系。当个体在时间焦虑的状态中难以自拔的时候，可以调整一下思维的聚焦，将焦点从社会时间转移到自身的命运时间表。其次，个体在现代性的时间状态下只是一个对象，感情、体验都没有得到重视，占卜术帮助个体将自身时间节律凸显出来，个体的体验得以解读。虽然社会时间的压力依然存在，但是个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尊重。再次，通过占卜术展示的个体自然时间节律带给个人希望，尽管他目前无法与外在的客观时间相合拍，但是在未来，他仍然有希望可以迎合外在的客观时间，抓住机遇。

2. 第二种情况：化解外在的社会时间观

除了预测外，每种占卜术都有一套包含了认识论和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做支撑。中国传统的五行八字所蕴含的相生相克的转化规律、西方现代占星术所蕴含的长时段视角，在占卜实践中都对化解人们的时间焦虑产生了作用。

何老师是70后占卜师，由于家传的缘故，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五行八字及其理论体系。后来他又系统学习了西方现代占星术，在两套体系的比较研究上颇有心得。他一开始并没有以此为业，只是业余帮人看看，随着案例的增多，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很多人基本上没什么特别突出的优点，也没有什么大毛病，长处短处加加减减，也就一个平常人。但他们来找我的意图很明确，希望我告诉他们一个时刻，可以一见钟情，或者大展宏图、名满天下，很着

急、没有耐心，希望天上掉馅饼、坐享其成。他们把算命看得太神，预测只是其一，还有一层是讲道理，帮人思考，就是“参悟”是其二。

有了这样的积累和思考，何老师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帮人占卜，在算命之余和人们分享命理知识的原理，启发前来找他的人做一些时间节律的思考。

他认为，中国人的八字包含了一套生克制化的哲学智慧，五行相生形成一个循环；五行相克又形成了一个循环。生克制化展示出来的世界观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相互联系、不断转化的，是一种制衡、平衡和转变的思维方式。这套体系不会将一个逻辑推到极致，没有极致、没有终点，越过某个节点就会发生转化，好比水满则溢、月盈则亏。

何老师在解读占卜结果的时候会有意识地将这种思维方式贯穿其中，当下社会的人们都非常注重世俗的成功，在八字的角度讲，就是注重官、杀、财。

财是好事，是资源、是财富，但是如果过旺而无制，就会“贪财坏印”。印是规矩、约束，财过旺而坏印，就可能唯利是图。官杀是权力、是威望、是掌控别人的能力，如果过旺而没有食伤来泄，那就会官杀攻身，身体都会有麻烦。个性、才华和想法的表露是食伤，可是食伤太旺而没有印来制，就空有想法，缺乏持之以恒将才华打磨出来的毅力。在八字的思维体系中，对你有利的东西不断壮大，如果没有东西制衡，就会崩盘；有利和制衡同步壮大才能形成转化。

赵鼎新认为^[34]，中国道家时间本体的关键在于转化和否定，历史没有终极目标和意义，但是有转化和规律。这种时间观充满智慧，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加平和的、非零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占卜术中化解外在的时间观念给个体带来的焦虑运用的就是这一原理。

何老师自学了西方现代占星体系，除了测算以外，他对西方现代占星体系中世代行星的概念推崇备至。

现代占星跟古典占星相比加入了世代行星的因素，天王星84年走一圈、海王星165年左右走一圈、冥王星248年走一圈，意义就是让人体会长时段的视角。命运不是某个个人事件，它是一个世代性的反映，人要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要那么纠结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时不我与”不是跟你一个人过不去。

中国传统的五行八字所蕴含的相生相克的转化规律、西方现代占星术蕴含的长时段视角，从原理上来

讲都可以帮助人们跳出时间效率化和线性进步观的框架，那么，在具体的占卜实践中是否有效呢？何老师坦陈，这更多的是一种努力：

坦白地讲，来找我的人里面还是想要个直接结果的人多，这个比例至少在七成左右。有不到三成的人愿意听我多讲一些背后的道理，这些人都是经历了些事的，自己阅历能跟上了。命理是一套的思维方式，人一辈子就这么长，一方面在于你怎么过，一方面也在于你怎么看待它。

占卜术背后的理论体系，重点都在于解构线性发展观，帮助人们重新理解时间问题、建立新的时间观念，从而有了走出时间焦虑的可能和途径。但是在现实中，这一条途径的作用尚待发挥。

六、占卜术缓解时间张力失败的情况

占卜术对个体时间焦虑的缓解并非总是有效，当个体未能打破外在社会时间带给个体的压力约束，人的体验也未得到重视，那么时间焦虑就无法得到缓解。

小莹的主要问题是婚恋不顺利，一直没有合适的对象，三十好几了还没结婚，“错过了人生婚嫁最好的年纪”。硕士毕业后，小莹在上海工作，收入不菲。面对“一把年纪还是单身”的状况，并非不着急，但她一直坚持认为如果找不到满意的伴侣，不如一个人好好过。但是生活在中原大省地级市的父母并不这样看待问题，他们认为人一辈子就是“出生—长大—上学—工作—结婚—生孩子—退休—养老”。小莹和父母在“人为什么要结婚”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她认为婚姻是感情问题，必须以提高生活质量为前提；父母则格外强调了人生的时间安排：二十来岁就应该结婚，三十岁之前生孩子，把这些都安排妥当了再说后面的事；否则，一个时间点没踩好，一辈子都要乱套。小莹在焦虑感的迫使下，寄希望于占卜术为她指点迷津。她先看了八字，核心内容是：

伤官大运，不利婚姻；但是，聪明莫过伤官，智商高，好好努力，事业上会有回报。

这个结果让她感到迟疑，因为没有告诉她确切的时间，焦虑情绪没有得到安抚。于是，她又有意识地借助了另外一种占卜工具——塔罗牌占卜，再次对自己的困惑进行探索。她对算塔罗牌时候的情形记得非

常清楚：

塔罗师就说，你现在不结婚才好呢，都是些烂桃花。现在这个时间对你来讲不是好的时间，你的长处和注意力应该都在事业上，把握那些能把握的事情，努力就有回报。

她认为这两次占卜结果都是避重就轻，转移话题，没有正面回答婚姻的问题，两种占卜术给她答案的前提都是默认个体结婚、生育、抚育的时间界限，只是告诉她在这个时间点你的运势不好，无法完成客观时间所规定的个人行为。所以，无论哪种占卜，都没有缓解她的时间焦虑。她仍然陷落在冷漠而不可逆的外在社会时间当中，主体性被忽视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对于时间的焦虑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被加剧了。

七、总结与讨论

1. 占卜术与时间焦虑：两种时间之间的张力与融合

人们通过占卜术所表达出来的时间焦虑，主要体现在时间效率化和单向度发展观两个方面。占卜术在缓解个体的时间焦虑时，与我们平常所说的算命算得到底准不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在于它是否满足了占卜者的如下几点要求：首先，它是否让个体的时间节律凸显出来并受到重视，个人的情感、价值、理念、体验得到重视和尊重。其次，如果个体的时间节律暂时不能与外在的社会时间节奏相吻合，那么占卜是否给人希望——或者在她自身的时间节律中有解决的方案，或者未来个体的时间节律能够与外在客观时间相吻合。这两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占卜术是否能够缓解个体的时间焦虑。另外一条途径是，占卜术是否帮助人们树立了新的时间观念，使个体能够从线性进步观和时间效率化当中跳脱出来，但这一条实现的难度要比上述两条大。

我们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总结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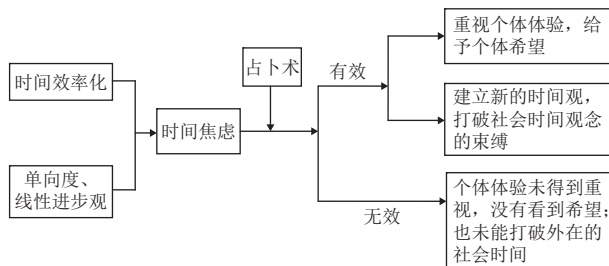


图1：通过占卜术应对时间焦虑的逻辑示意图

2. 几点讨论

最后，我们将在结论的基础上略做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人在时间面前拥有了主导权是否意味着人在时间问题上实现了自由。在社会时间观当中，对时间拥有主导权的是抽象的“人”，而非具体的个体。社会时间经过了抽象成为一个标准的度量衡凌驾于个体之上、衡量具体个体的自然节律时间。技术的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并不是自由时间，而是时空压缩，个体被卷入充满现实紧迫感的生存状态当中，人们不但没有获得更多的自由，反而被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压制和剥夺。社会时间与个体自然节律时间之间的张力是难以消除或弥合的，并且还会不断扩大。

第二，时间焦虑形成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在应对策略的选择上却是个体化的。新自由主义带动的不仅是资本、技术、权力的全球流动和扩张，还将个体推到了最前端。个体看似是有了更多的流动和选择的自由，但是竞争、责任和风险也都变成了个人的问题，困境的形成倾向于对内归因、困难的解决最根本是要依靠个体自身。人们选择各种方式和策略应对社会时

间的压力和由此带来的时间焦虑时，都仍然是个体化的行为。只要“竞争”“增长”“扩张”还掌握话语权，产生焦虑的结构就还存在。

第三，除了预测之外，各种占卜术背后的认识论和世界观可以帮助人们用以建立意义的体系。人的意义通过个人与他者、与环境的关系而构成。人们关注“我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究竟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等问题将自己嵌入意义体系中，对于自身处境和行为的理解，需要通过将他人作为参照才能赋予其意义。占卜术重视对个体生活的理解、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策略来解决来源于社会时间的压力问题，但是最终探讨的仍然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情感，个人只有将自身放置在如此种种的共同情感之中，其行为和处境才是可以被理解和解释的。各种占卜术给出的解释，其背后蕴藏的逻辑，都是在指示个体的行为、情绪、观念、情感在共同情感当中的位置问题，而这种位置一旦脱离了社会便无法解释并失去意义。■

邢婷婷：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社会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陈晨

参考文献：

- [1] 赖立里, 张慧. 如何触碰生活的质感——日常生活研究方法论的四个面向[J]. 探索与争鸣, 2017(1): 104-110.
- [2] 成伯清. 时间、叙事与想象——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J]. 江海学刊, 2015(5): 100-106.
- [3] 石畅, 赵展慧. 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期, 社会不公加剧不安情绪[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10-21.
- [4] 李耕. 当代算命占卜的自我合理化[J]. 民俗研究, 2014, 116(4): 145-152.
- [5] 练宏. 注意力分配——基于跨学科视角的理论述评[J]. 社会学研究, 2015(4): 215-246.
- [6] 曹东勃. 时间意识的现代嬗变[J]. 社会科学辑刊, 2008, 176(3): 17-20.
- [7] 葛兆光. 严昏晓之节——中国古代关于白天与夜晚观念的思想史分析[J]. 台湾大学历史学报, 2003, 32(12): 33-55.
- [8] 牟岱, 张岩. 超越“活在当下”的现代性自由困局——论马克思社会时间观与人的自由[J]. 外国社会科学, 2016(3): 11-17.
- [9] [德]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0] [法] 爱弥儿·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 汲喆,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1] [英] 埃文斯-普理查德. 努尔人[M]. 褚建芳, 阎书昌, 赵旭东,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12] 尤西林. 时间与现代性[J]. 学术月刊, 2003(8): 20-33.
- [13]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14] 吴国胜. 时间的观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15] [23] 伍麟. 社会焦虑的时间视角[J]. 哲学动态, 2013(5): 80-85.
- [16]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17] 华红琴, 翁定军. 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与焦虑[J]. 社会, 2013, 33(1): 1-25.
- [18] Hunt, Alan. Anxiety and Social Explanation: Some Anxieties about Anxiet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99, 32(3): 509-528.
- [19] 张慧, 黄剑波. 焦虑、恐惧与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7, 38(9): 6-13.
- [20] [法] 爱弥儿·涂尔干, 马塞尔·莫斯. 原始分类[M]. 汲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21] 朱迪. 金砖国家中产阶层的发展概况和困境[J]. 文化纵横, 2016(4): 52-59.
- [22] 朱宇晶. 财富焦虑与中国式金融主体化: 基于温州的民族志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7, 38(9): 29-36.

(下转第63页)

- [5] 金萍华, 芮必峰. 身体在场: 网络交往研究的新视角[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1(5): 12-16.
- [6] 郭建斌. 在场: 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独乡田野资料的再阐释[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08(6): 193-217.
- [7] 张一兵. 拟像、拟真与内爆的布尔乔亚世界——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 2008(6): 32-38.
- [8] [法] 让·鲍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M]. 车槿山,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75-76.
- [9] 极光大数据发布《王者荣耀研究报告》[EB/OL]. <http://gad.qq.com/article/detail/30727>, 2018-2-1.
- [10] 王者荣耀热点报告[EB/OL]. <http://mi.talkingdata.com/report-detail.html?id=529>, 2018-9-17.
- [11] 张键. 面向人脸识别的图像表示和分类研究[D]. 南京: 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
- [12] 荣建群. 口述记忆组合图像年龄和表情变化的修整. 郑州: 河南省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2002. 转引自陆丽. 基于人脸图像的性别识别与年龄估计研究[D].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105.
- [13] M Weston, AE Friday, L Pietro. Biometric Evidence that Asexual Selection Has Shaped the Hominin Face Eleanor [J]. Plos One, 2007, 2(8): 710.
- [14] R Brunelli, and T Poggio, HyperBF networks for gender classification [J]. Proceedings of the DARPA Image Understanding Workshop, 1992: 311-314.
- [15] A Sammal, V Subramani, D Marx. Analysis of sexual dimorphism in human face [J]. Journa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 Image Representation, 2007(18): 453-463.
- [16] [美] 卢里. 解读服装[M]. 李长青, 译.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0: 205-206.
- [17] [英] 乔安娜·恩特维斯特尔. 时髦的身份——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02.
- [18] 郑新蓉. 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 [19] 盖尔·卢宾. 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A].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 43
- [20] [美] 福赛德. 格调: 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M]. 梁丽真,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75
- [21] Timothy S. Freson and Linda Boynton Arthur. Fashioning Men's Bodies [A]. Andrew Reilly, Sarah Cosbey. The Men's Fashion Reader [C]. Fairchild Pubns, 2008: 337-340.
- [22] 袁梅. 审美文化视野中的“小资”和“小资情调”[J]. 齐鲁学刊, 2005(5): 90-93.
- [23] Davis, Deborah.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24] 程新宇. 女性的身体和女性的尊严——医学整形美容的伦理省思[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2): 120-125.
- [25] B Raphael. The Anatomy of Bereavement: A Handbook for the Caring Professions [M]. Hutchinson. 1984
- [26] 林菲, 周跃平, 刘伟新, 黄河浪. 女性衰老特点及主要影响因素的研究概况[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7(3): 757-758.
- [27] 朱晓兰. 凝视理论研究[D]. 南京: 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 12-15.
- [28] 雷晓燕, 许文健, 赵耀辉. 高攀的婚姻更令人满意吗? 婚姻匹配模式及其长远影响[J]. 经济学(季刊), 2015(1): 31-50.
- [29] 章逸然, 章颺, 胡凤英. 女大难嫁”还是“男大难婚”——婚姻匹配的男女差异与“剩男剩女”的代价[J]. 人口与经济, 2015(5): 13-24.
- [30] 余海菊, 殷朝华, 李喜燕. 抑制或鼓励——如何看待大学生女性男性化现象[J]. 中国性科学, 2014(12): 97-100.

(上接第 86 页)

- [24] Yang C.K. 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 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 [M]. 1959. Cambridge: MIT Press.
- [25] 李亦园. 文化与修养[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26] 陆致极. 中国命理学史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27] Goode, E. Paranormal Beliefs: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M]. Prospect Heights, 2000. IL: Waveland Press, Inc.
- [28] Schouten, S. A. Attitude about Technology and Belief in ESP [J].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83, 53, 358.
- [29] 董向慧. 中国人的命理信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30] 潘天舒. 文化全球化与多元信仰实践: 美国“新时代运动”的人类学解读[J]. 思想战线, 2016(2): 8-13.
- [31] 梁永佳. 庙宇重建与共同体道德——以大理乙村空间差异为例[J]. 社会学研究, 2018(3): 92-114.
- [32] 邢婷婷, 潘天舒. 焦虑的个体与非制度性意义体系——关于多元信仰实践在当代城市中国青年人群中兴起的原因考察[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 37-46.
- [33] 萧易忻. 从全球化视角看“抑郁症”如何产生[J]. 文化纵横, 2016(2).
- [34] 赵鼎新. 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J]. 社会学研究, 2018(1): 17-40.